

# 旅游人类学视野中的“旅游文化”

彭兆荣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旅游人类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是许多应用学科中的“后进者”。但是,旅游人类学对“旅游文化”的研究不仅成为该分支最具学科性的核心价值,也成了其他学科乃至决策部门关注的重要内容。本文试图对旅游人类学研究视野中“旅游文化”以及相关的问题作一些评述和分析,借此提出一些问题以期引起学界的注意和重视。这无论从学科的理论反思抑或是应用层面都是有益的。

[关键词] 旅游人类学;旅游文化;移动性;范式;民族志

[中图分类号] F5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006(2004)06-0020-08

## 一 背景、定义与学科概说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旅游以其独有的方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种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西方和亚洲地区出现了快速成长的趋势。它一方面表明大规模的个人化“群众旅游(mass tourism)”时代的到来;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巨大影响,它也起到了降低国际间的壁垒、疏导国际间相互关系等作用<sup>[1]</sup>。80年代以后,旅游更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种时尚;它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情形:只要你可以阅读到的、可以看到的旅游,也就可以去实现它。它甚至成为一种社会指令:每一个人必须到其他一个什么地方,到另一个人的“家里”去花一些钱<sup>[2]</sup>。简言之,不去旅游便属于“过时的”生活方式。

毫无疑问,旅游并非“单一的实体(a single entity)”,而是一个类型(pattern)。它包括了旅游设备和旅游活动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一方与另一方的互动——特别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sup>[3]</sup>。换言之,旅游作为一个系统,其自身不仅具有系统特性,而且

与一个更大的社会系统构成一种特殊的“语境(context)”<sup>[4]</sup>。尤其是当代旅游介入“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关系时,必然融入大量的政治经济、生态环境、文化传统等因素。这也决定了我们所面对的旅游现象不会只局限于某一个具体的行为,某一个阶级、阶层的范围,且带有明显现代性的“话语特征”和“文化特质”。

建立这样的认识并不困难,可厘清其中的关系并诉诸决策和实践却不容易。问题是,发生在旅游中的一些重要因素迄今为止仍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比如对“地方性力量(regional force)”的认识和研究就明显不够。在当代的旅游研究中,虽然人们已经充分注意到“东道主”扮演着旅游实践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但我国绝大多数的研究都只集中在“东道主”社会外部的、可视的、政策的、行政的、操作的等方面,鲜见对东道主社会的、族群的、地方知识的、文化系统内部动力对突如其来大规模旅游的承受力方面的深入研究,比如小规模社会结构在旅游冲击下受摧残的预估与预警,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所固有的“关系链”的断裂,族群认同的自我传袭能力的弱化等。至于一些更细小的具体行为,如有些民族或族群的神圣仪式、秘祭、圣物等原先对“外”(外界、外族、外人)禁忌的活动和物品骤然公诸于众,甚至拿到市场上“贱卖”时的感受和感觉等,都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注意。大规模旅游的兴起在形式上就像一种对地方社会的“大举入侵”,有的学者称之为“帝国主义行为”<sup>[4]</sup>、“新殖民主义政治经济学”<sup>[5]</sup>。鉴此,不少学者呼吁重视“全球系统”中的“地方文化系统”在旅游冲击下所造成的伤害<sup>[6]</sup>。更有学者提出了“旅游的道德化”概念<sup>[7]</sup>,试图从生态和文化方面对群众旅游提出更高要求。

这些情形很自然地会反映在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众所周知,旅游人类学作为一个分支学科的诞

[收稿日期] 2004-08-05; [修订日期] 2004-10-02

[作者简介] 彭兆荣(1954-),男,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人类文化学和旅游人类学。

生几乎是最为年轻和晚近的。狭义的旅游人类学,即指严肃的、专门从事人类学的旅游研究直到 20 世纪中叶才出现。按照纳什的说法,严肃的旅游人类学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努内兹(Nunez)于 1963 年发表的关于周末在墨西哥村庄旅游的一篇文章。那个时代也是旅游正在成为世界上主要产业的历史过程。随后,旅游在社会发展当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人类学研究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跟进<sup>[8]</sup>。格拉本则将人类学对旅游的研究(作为学科性质的)时间定位于 20 世纪 70 年代<sup>[9]</sup>。

从学科角度看,尽管旅游研究在国际学术界骤然升温,可是哪怕在一些基本的概念使用上仍存在差异。在西方,涉及到旅行和旅游的一些概念,像“旅游(tourism)”、“旅行(travel)”、“旅行(tour)”、“旅途(journey)”、“旅程(route)”、“行游(trip)”、“航游(cruise)”……之间有所差别,“原义”与“衍生义”也不同。同时,这些词汇本身的意义也在不断变化,比如旅行(travel)一词,据考源自法语 *travail*,原来用来指繁重而艰苦的工作,而现在却经常用来表示“好玩(fun)”<sup>[10]</sup>。再比如,tour 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原指经过一次外出巡游后回到自己的家。而“度假(vacation)”一词原先来自一个动词 *vacare*,意思是把地方腾空,搬空。而 holiday 原指“不工作”<sup>[10]</sup>。与西方相比,我国在“旅游”的词汇表述方面虽不及西方那么细致,意义却要深邃得多。比如中国古代的“游”中不仅有老庄“逍遥游”的道家思想,也有“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的儒家伦理;有“职业化”的专门人群,如早在汉代就出现了“方士”、“儒生”、“游侠”和“流徒”,更有社会道德体系对“游”的不同分类和评价<sup>[11]</sup>。所以,我们在“舶来”的同时,更有一个“本土化”的艰巨工作需要完成。

至于旅游定义,即使是放在“现代旅游”的范畴内,由于不同社会、不同时代背景、不同研究领域、不同旅游经历和经验,都会在同一定义上出现见仁见智、人言言殊的情状。我们不妨撷取几个旅游定义或描述供大家参考:

1. 笔者偏向于将旅游定义为:以生活中剩余的财政计划为前提,以自愿为原则,以休闲或积累不同经验为主要目标,到异地或“异文化”中去体验的旅游行为。(笔者自述:a. 有富余的财政支出。b. 自愿。c. 离开日常熟悉的生活环境。d. 休闲和积累经验等为基本要件。)

2. 旅游反映出游客对一个非常广泛的和与旅游相关产品的积累需求和消费类型<sup>[12]</sup>。(笔者评

述:这样的旅游描述基本上是把旅游当作一种商业活动和商业行为。)

3. 旅游包括着许多观念和观点,人们根据观念和观点做出他们外出旅行的决定,包括去哪里,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如何对待其他游客……(笔者评述:这样的概括和描述完全是从游客的角度,即从游客的行为、观念和社会价值来看待旅游的。)

4. 基本上说,旅游是一种关于地方的经验(tourism is about experience of place)。旅游的“生产”不是旅行者的目的地,而是在旅游目的地所发生的一系列相关性和互动性事情与事件的经验。(笔者评述:这样的定义主要以游客的旅游经历与经验为出发点。)

5. 事实上,旅游是多种现象结合在一起促使人们离开他们日常居住的环境,去到一个旅游目的地作暂短的旅行生活,其中包含动力性的、稳定性的和结果性的多种因素……<sup>[13]</sup>。(笔者评述:这样的定义具有社会现象学的痕迹。)

6. 旅行是包含了一系列因素并使人们自愿离开“家(home)”到一些“异(other)”地去,这种生活或工作居住地的变化是为了获得知识和经验<sup>[14]</sup>。(笔者评述:这样的定义明显具有人类学的色彩。)

7. 旅游是作为一种产业来满足游客的需要,或者是作为科学、艺术和商业的角度以吸引游客造访,并迎合游客的需要和要求<sup>[15]</sup>。(笔者评述:定义具有商业社会学之嫌。)

8. 旅游包括三个基本的因素:人——旅游行为的作者,空间——所涉及到的物理因素以及时间——游客在旅行和暂时居留过程中所体现在时间上的消费因素<sup>[16]</sup>。(笔者评述:定义带有物理学和哲学的指喻意味。)

……

更有甚者,在同一个学科领域,比如不同的人文学家也会出现不同的看法,如对旅游因素的总结,有一种类型包含了下列因素:1. 旅行要求。2. 旅游中介。3. 旅游目的地的影响。4. 综合性作用<sup>[17]</sup>。另一种类型则包含了如下几种因素:1. 暂时性的休闲。2. 可支配的开支。3. 旅游的伦理<sup>[18]</sup>。史密斯就此还归纳出一个等式:

$$T = L + I + M$$

旅游(Tourism) = 休闲时间(Leisure Time) + 可供自己支配的收入(Discretionary Income) + 积极的地方认可(Positive Local Sanction or Motivation)(对旅游目的地的认可)<sup>[19]</sup>。

对旅游的定义多种多样,对游客的定义同样丰富迥异。

史密斯对游客定义比较精炼:“游客是指处于暂时休闲的人离开家庭并以经历变化作为基本目的”<sup>[20]</sup>。

麦克内尔的定义也较简约:“旅游者是一个行动的人,或人们是行动中的旅行者。同时,旅游者是现代人最合适、最好的模式”<sup>[21]</sup>。

国际旅游组织联合会(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Travel Organization,简称IUOTO)则这样对旅游者下定义:旅游者是一种暂时性的访问者<sup>[22]</sup>。

……

为现代旅游和游客找出一个具有共识性或公认性定义之所以困难,除了我们上面所列举的原因以外,还由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族群意识等在旅游和旅行中所附加的意义和解释。如果我们把旅游行为、旅游现象和旅游文化都定位在现代社会,就必须与现代意识、现代价值、现代社会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等结合在一起。麦克内尔在《空聚场》(Empty Meeting Ground)一书中认为:“人们浪迹天下的意识在旅游行为中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建立完整世界中永久性的家居生活”<sup>[23]</sup>。或许也可以这样理解:现代社会“稳定”的家居生活是通过不断“移动”的旅行方式获得的。这在表面上仿佛悖理,却符合现代生活的“历史真实”。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变化,“全球化”的加速到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等,致使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已经很难囿于一个稳定不变的工作场地,许多工作的完成和生活目标的实现都有赖于旅行活动。这也使得现代人已经非常习惯在旅行中生活,出现了空前的迁移行为和移动意识。它成为完整而稳定的现代家庭生活的基础性结构要件。也是“现代性”的一个突出特征。

旅游对人类学研究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纳什在《旅游作为人类学的一个主题》中归纳出3个方面:

1. 旅游包含着不同文化、亚文化之间的接触。对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交流与研究正是人类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主题。

2. 在人类社会中,旅游是普遍存在的一种人类活动,它在复杂社会中的各个层面中都有表现。

3. 旅游是“前工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种重要现象和因素<sup>[24]</sup>。

无需讳言,面对“文化”的讨论以及因此遇到的一些难题,人类学界也存在不同的声音,比如纳什坚持把它放在具体的“游客”与“东道主”所代表的不同

文化的“遭遇”上来考察。他认为,旅游是一种不同文化间的遭遇并导致社会的转换。这种文化遭遇有多种形态,它不仅是一个群体(游客)在游玩,另一个群体(旅游工作人员)在服务这样的简单遭遇关系;还可以加入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交流,比如,东道主社会的民众可以分为积极的观察者和消极的观察等。与此同时,社会其他方面的因素也盘桓于不同的文化遭遇之中,有政治的、商业的等<sup>[24]</sup>。史密斯对此的看法不同,认为文化交流是一种“涵化”(文化变迁的一种形态)。人类的文化互动不是商业贸易和商品交换,它是一种关键因素。人类学对旅游民族志研究是强调旅游作为文化变迁唯一的因素<sup>[25]</sup>。这些差异既表现出旅游活动中存在着文化多样性,也显示出旅游人类学在研究中对待文化多样性的不同主张。

## 二 移动、范式与旅游文化

詹姆斯·克里福德在1997年出版的重要著作《线路:二十世纪晚期的旅游和迁移》里,开宗明义,把出现在20世纪晚期的旅游和迁移的社会现象概括为“旅行文化(traveling cultures)”,并把这种旅行文化置于人类学研究的视野之中。作者在讨论“旅游文化”之前,引介了人们对发生在当代的旅游现象的一些说法,诸如,在时间的流逝中,旧的帝国大厦会倾覆,新的将取而代之。新的阶级关系不得不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主要并不是表现在物质的质量和使用方面,而是其运动——即不是你在哪里,或你有什么问题,而是你从哪里来,你去哪里以及你的这种迁移的数率问题。我们只要稍作比较,就会吃惊地发现不同时段的人类学家在同一问题的看法上有着天壤之别: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把他曾经在1937年旅行中暂时栖身的地方——巴西中部的一座城市形容为“文明的野蛮象征”,是一个供人临时聊以度日而不是居住的地方。这种差别与其说是出自不同人类学家的见解,还不如说是旅游本身在社会变迁中地位的改变,是“旅游范式”的改变所致。借此,克里福德把旅游以及旅游中所包容的各种事项当作一种对“范式空间(a paradigmatic place)”的转变和占据。他称之为“斯夸托效应(Squanto effect)”。斯夸托是早期印第安人于1620年,在位于马萨诸塞的普利茅斯(Plymouth, Massachusetts)地方迎接各地来的朝圣客的活动(1620年也是在普利茅斯建立英国清教徒朝圣制度的时间——笔者)。他们帮助这些朝圣客们度过寒冷的冬天,学习讲好英语等。这一切让人们想起那些从欧洲大陆远渡重洋寻找“新

世界”的迁移者和旅行历程。在作者看来,20世纪旅游远非简单意义上人群在空间上的移动,而是深刻地触及到了社会的内部构造,是一种特殊社会文化的表述、表达和表演的范式<sup>[26]</sup>。据此,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出,克里福德所讨论的“旅游文化”是试图通过对发生在20世纪晚期旅游现象的分析,以展示在旅游活动和隐蔽在旅游活动之后的社会文化变革的图像、形貌和范式。

克里福德所界定和讨论的“旅行文化”的“大视野”虽然让人觉得有些“庞杂”之感,但就旅游研究而言,对旅游文化发生学做谱系上的“文化考古”无疑是必要的。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克里福德所确立的“旅行文化”才会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最近一些有影响的旅游人类学和旅游社会学著述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旅行文化”影响的痕迹,比如罗杰克和尤里主编的《旅行文化:旅游和旅游理论的转型》一书即是受到萨依德《东方主义》(东方学)一个重要的立论依据也是“旅行文化”——笔者]和克里福德“旅行文化”概念的启发<sup>[27]</sup>。他们认为,“旅行文化”的前提并不是建立在操作性的行为之上,也不是建立在抽象的经济策略之上;而是将它置于更为广阔的、以“旅行”为基本特征的社会文化现象中加以检讨<sup>[27]</sup>。

由于旅游与文化之间的边界并非泾渭分明,因此,从文化的高度去看待旅游现象便有其内在的逻辑依据。首先,这是因为“社会的文化化(culturalisation of society)”的结果。其次,许多原先赖以维持差异和特点的边界关系随着文化创新的发生和发展,变迁和“漂移”打破甚至超越了既定的边界关系。比如,对某一个传统的东道主社会来说,它原来的社会结构主要由族群性、社区历史、社群,——即“面对面的社群(face to face community)”内部的文化关系建立起来的。“我们/他们”的关系确认主要指族群与邻近族群或人群之间的认同。但随着当代旅游产业兴起,必然形成一种非常独特的“游客/东道主”的新型关系。为了适应群众性的旅游活动,东道主社会必须根据游客的各种需求在自己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上进行调整。这种快速的变化打破原有的“边界”架构。再次,游客来自不同的社会、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他们不仅只是来观光,还要参与“异文化”的观察和体验。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一种“文化旅游”。它增加了旅游活动的“文化化”<sup>[27]</sup>。

与此同时,“文化”也在旅游中“旅行”。毋庸置疑

疑,“文化”并非是不着边际的东西,它会附着于人群、性别、阶级、商品等进行传播和再生产。当代社会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所谓的“移动性(mobility)”。既往的“边界”已经被打破:资金、资本、观念、形象、信息、人群、物品和技术都在移动<sup>[28]</sup>。“文化”成了一个最具黏附力的“附着物”而产生变迁和移动,而且越来越快。这种“移动”还不只是具体的人和物质,随着媒体的发达,电视、电影、广告、书籍、报纸、杂志等都加入到对各种事物,甚至是观念的“移动”和“转变”中,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旅游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移动。除了游客要离开日常家庭生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做暂时性的旅行外,他们还随身“携带”着诸如符号、隐喻、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sup>[29]</sup>。它不只表现在“流动”的速度上,更重要的是,“流动—移动”本身成了一种现代社会的属性。现代旅游和旅游产业正是这一属性的社会表现。这样的变化与变革从观念到范式给民族志所带来的影响和作用同样也是革命性的<sup>[30]</sup>。

“文化旅游”,特别是现代旅游,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大规模旅游产业的情况来看,都具有短时期“时尚”的某些特征。人们或许会提出,“文化旅游究竟是一种风气(fad)还是一种新的社会形式”这样的问题。克雷克试图说明:1. 旅游作为一种文化对发生在文化领域里的一系列矛盾现象能够起到舒缓作用。2. 文化旅游本身并非就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和事实,它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是在当代的旅游活动中它所包含着新的品质而已<sup>[31]</sup>。她是这样定义“文化旅游(cultural tourism)”的:“通过习惯性的旅行,使游客进入到其他文化和其他地方去了解当地的民众,他们的生活方式,遗产和艺术;以直接的方式真正了解这些文化以及它们在历史语境中的表现”<sup>[31]</sup>。为了进一步加以辨析,她也对“旅游文化(the culture of tourism)”作了界定:“最大限度地获取旅游文化的产品价值,重新确定游客的经历和经验,确定旅游的文化影响,适应旅游产业的文化变化”<sup>[31]</sup>。在此基础上,她还对当今的旅游发展趋势提出两个策略性的建议和原则:“融文化于旅游与游客,融旅游于游客与文化(moulding culture for tourism and tourist, and moulding tourism and tourist for culture)”<sup>[31]</sup>。因此,“文化旅游”可能表现出某种时尚的特点,却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社会的“自在性”。

更为重要的是,在当代的旅游现象中出现了一种越来越向“文化旅游”方向发展的趋势,它在很大程度上使我们看到某种历史和文化在发展中的变化

轨迹。换句话说,在当代“旅游文化”中的“文化旅游”原本就是历史演变的一种必然进程。这种变化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认知方式,甚至改变了人们的表述方式。比如,在现代社会中,人们获取知识途径的一个变化已经从传统的主要以“耳闻”的方法转变到“眼见”上面来。即使是以前的所谓“眼见”亦主要以阅读书籍这样的方式获得知识。克蕾克指出,现代社会已经进入到“从耳到眼的转移(shift from the ear to the eye)”,而旅游行为本身正是以发展的“观光”——从读、说进入到实地现场进行观察的层面<sup>[31]</sup>。今天,“在知识来源和作为社会的‘物态’表述,眼睛变得跟耳朵同样的重要。知识的获得需要通过看、实证来加以确认。观察、目睹以及听说构成了‘眼睛的技艺’,成为一种新的旅游形式——观光”<sup>[32]</sup>。

我们讨论“文化旅游”必然还会涉及一个概念“文化地图(cultural map)”,它也是近来学术界较为关注的一个内容。格尔兹在《文化的解释》中使用过类似的说法<sup>[33]</sup>。“地图”属于地理学上较具专业色彩的一个术语,当它被移植到旅游研究时,很自然就带有人文地理学的价值。它将一个具有地理空间的概念引入到了旅游文化;也可以反过来说,旅游文化使某一些纯粹的地理空间指示变得富有文化色彩。比如游客通过旅游地图的指引和指示到达某一个旅游景区和景点。在这一个简单的关系中,“地图”与“景物(monument)”建立了关系。由于“地图”所引导的地理空间和场所被社会历史赋予了非同寻常的文化价值(“monument”其实就是一种历史的特殊记录和纪念的意思),因此,“地图”所引导者就包含了“文化旅游”。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看,“地图”引导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叙事(cultural narrative)。简约的表述是:由旅游地图所引导的一个具有特定历史、文化、族群认同的空间以及空间中的景物,构成一种特殊的、充满了“边际性文本(marginal texts)”<sup>[34]</sup>。这一特殊“文本”所包含的政治化指示与人们理解地图和纪念景物构成了一种不可分割的叙事和记录,并使之为规范化的媒介活动<sup>[35]</sup>。由“地图”与“景物”所共建的情境不仅反映出了日常生活的图景,也增进了时间和空间自然化权力的表现<sup>[35]</sup>。逻辑性地,这种结果又导致了所谓“物质化话语(discourse materialized)”的形成<sup>[36]</sup>。人们有理由诘问:为什么游客会被旅游地图中的“这些”(而不是“那些”)标志物(markers)所吸引和引导并最终导致他们到那些地方去旅游?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这些”(而

不是“那些”)标志物能够有幸出现在地图上……如此看来,“文化旅游”显然是一张组合了时间、空间、地方、景物、族群认同和社会叙事等多重边界的“文化地图”。

### 三 田野、写作与民族志

人类学家把在田野工作中的“旅行”作为一种特别的概念和行为,它包含了田野工作者自愿离开“家庭”到一个“异地”去生活和工作,以获取所需要的东西,包括物质方面、精神方面和科学方面的材料<sup>[37]</sup>。这样的理念和行为有助于我们在看待“田野工作”时,一方面把它视为人类学方法论上的一种理念和手段;另一方面又把它看作一个具体进行专业活动的“地点”。人类学家的“田野作业”首先被确定为一个改变居住环境和工作的地方,一个进行“参与观察”的场所。早在20世纪20年代,它就被视为一种“微型移居(mini-immigration)”,以便于田野工作者去适应和学习当地的文化和语言<sup>[37]</sup>。所以,“田野”本身也是一种松散而长时间的旅行活动。

一个具体而确定的“田野点”,比如一个村庄、一个部落、一个社区、一条街区……对于人类学研究之所以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能够提供给人类学家相对稳定和固定的生活环境,让人类学家们有可能观察和了解当地生活的全貌并达到“深度描述”。“田野点”是他们的“工作坊”。没有这一个具体的“作坊”,人类学家便无法进行他们的民族志“作品生产”;也无法参与到当地“社会再生产”的工作程序中去(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家本身也多多少少参与了当地的“社会再生产”)。所以“微型移居”既不是一般旅游中常提到的“日常生活”居所,亦非简单意义上的“东道主社会”,而是一种特殊的“居处”。这就带出了一种“身份”,即人类学家属于介于“游客/东道主”之间的“半主半客”状态。而这种深度的“民族志旅游”已经或必将成为现代旅游的一种形态<sup>[38]</sup>。

然而,从学理上看,传统的民族志研究是把“田野”视作一个异文化的“场域(field)”,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被当作一个静态的、封闭的、落后的假定。或许正是由于以传统的民族志方式对现代旅游活动进行田野作业时所表现出的局限,比如,在对事件了解的时间上受到限制,特别对游客的调查要达到“深度的田野作业(in-depth fieldwork)”就有一定的难度并产生其他一些问题<sup>[39]</sup>。可是,人类学家们同时看到,现代旅游现象与社会的“流动性”是一个紧密结合的产物。既然以传统的对封闭的、小规模、简单的社会和社

区的研究方法不容易从根本上解决对现代旅游现象的调查和研究,这就意味着研究范式有必要进行改变和变革。正是在这一原则下,一批人类学批评家通过对旅行以及移民社会的研究,提出了各种新的不同主张,如“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s)”<sup>[40]</sup>、“建构田野(Constructing the Field)”<sup>[41]</sup>等。这种带有“范式变革”的转型,不仅意味着民族志研究在族群和传统学科领域受到了挑战<sup>[42]</sup>,同时也是对所谓“表现危机(the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的一种回应<sup>[43]</sup>。

旅游人类学的田野作业显然对传统民族志的范式提出了尖锐的拷问,原因是它的两个前提条件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1. 通过对旅游活动和行为这样具有极大的“游动性”人群、阶层、活动来反映当代社会,反映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接触与交流。即使对旅游目的地的调查也已经不是单纯地调查东道主社会的文化类型、社会机制和族群认同等方面的变化,也要去观察、了解和分析那些来自不同的国家、民族和阶层,且又在旅游目的地作暂时停留的游客;他们成了决定研究对象变化的动力与根据。2. 由于调查对象在时间上的暂时性特征,旅游活动中的许多外在现象具有“万花筒”的特点,使得民族志写作面临一个学术困境。杰姆逊在讨论后现代性的时候认为,一个具体可感的文化领域具有其自己的确认逻辑,这个逻辑就是通过“客观世界”自我的转型成为一系列的文本或幻像(a set of texts or simulacra)<sup>[44]</sup>。他认为,在后现代的文化中,把生活中那些变形的和碎片化的事物反射到一个巨大的镜面上,可以被视为范式程序的改变,它在生产过程中起到核心作用<sup>[44]</sup>。

多斯特在《记录的郊区:一个美国的景区,一个民族志的困境》一书中,试图通过对美国宾夕法尼亚的一个叫做“查斯福德(Chadds Ford)”的地方成为美国旅游目的地的调查,带出一个民族志写作与记录“范式”上的问题与困境。查斯福德的“后现代性”在表面上只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一个旅游景区,大量的游客来到这里享受他们的休闲时光。自然风光是吸引游客的主要资源。另一方面,查斯福德地处郊区<sup>[45]</sup>，“旅游”与“郊区化”成了作者的主要投视点和“两种社会形式”。但二者之间在后现代的背景下完成了一种相互间的变动和转型:一类是可以按照“自我(self)”的意愿过着类似于日常惯例性生活;另一类则是服从作为现代和真实的“自我”的要求以适应快速变化的需要<sup>[45]</sup>。面对这样情形,民族志学者的记录,按照多斯特的说法,便属于“自动写作(auto-writing)”的“自动民族志(auto-ethnogra-

phy)”范式。具体地说,作为一种对象与写作之间的关系,所谓“自动民族志”是指文本的制作总体上没有事先的预设。因为在后现代的背景下,游客通过对旅游以及旅游目的地选择,某一个旅游目的地作为一个历史性“文本的产生和存在”具有其“自我”的内在逻辑,而民族志“文本”自然也就跟随着一个“自我”移动的目标。作者干脆称之为“后现代民族志实践(post-ethnographic practice)”<sup>[45]</sup>。他认为,按照传统的民族志要求和写作范式来看待和对待类似查斯福德这样的“景点”几乎是不可能的<sup>[45]</sup>。简言之,对旅游的“移动性”研究一方面考验着传统民族志写作范式的现代“效力和信度”;另一方面,也促使了民族志写作的另一次革命。

旅游民族志除了从整体的角度看待旅游发展中的各种因素外,在具体的田野调查时也没有忘记与传统人类学方法(总体)与旅游民族志方法(具体)的有机结合。传统民族志调查方法一般强调所谓的“五个W”:谁(who)、何时(when)、何地(where)、什么(what)、为什么(why),另可加一个怎样(how)。旅游民族志在具体对象上又表现出自己的特色。按照史密斯的看法,概括起来就是所谓的“四个H”:旅游景区与景致(Habitat)、历史(History)、遗产(Heritage)和工艺品(Handcrafts)。“四个H”大致包含以下一些要素:

旅游景区与景致(Habitat)。旅游景区主要指那些为游客所吸引的物质形态,它大致有:1. 各种引导游客通往、进入或到达旅游市场的渠道与途径。2. 因为气候等原因所导致的游客变化。3. 专门为游客创造的那些参与性活动。4. 自然环境和风景等。在这里,一个关键因素是那些为游客所创造、设立、建造、组织、制造的景物、景致、项目和活动<sup>[46]</sup>。尤其应该注意东道主地方在组织和安排这些项目和活动中所借用和利用的资源以及这些资源的价值,包括可以量化和不可以量化的部分。比如东道主社会为吸引游客建立一个“民族村”、“民俗村”,它所花费的实际费用和这一项目对本民族或族群可能造成的环境和文化上的影响等。

历史(History)。这里所说的“历史”主要指在现代大规模旅游进入以前,当地与外来者的接触与交流状态的历史记录,借以将过去那种与外界交流、交往的历史形态和现代旅游产业的接触、交流作一个“历时性”的参照和比较。同时,在这种历史性的比较当中确认地方传统的自然形态与外界交往,特别是在政府组织下的或个体旅游之间的变化与差异。它包括诸如旅游活动的确定者,冲突的起因与化解,

现代展演性案例,边缘人与群体的关系等因素。

遗产(Heritage)。指那些地方群众认为有代表性和有欣赏价值的传统文化遗产。这可以成为一个分析的视角。遗产包括诸如博物馆、纪念仪式事件、大型的节日庆典、民族中心、民俗村等。从某种意义上说,遗产并不是历史。历史记录事实,有的时候也在制造“伪事实”;而遗产使历史获得生命,是一个活的历史博物馆。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遗产具有特别的“附加值(value added)<sup>[46]</sup>”。在对这些遗产进行调查和分析时,我们除了要了解它们独特的地方性和民族性品质以外,还要关注与这些遗产发生关系的制度性组织、机构以及地方精英之间的关系。毕竟这些组织和个人对选择、确认到具体策划项目都起到重要的、有时是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所说的遗产除了那些“物化”性遗物、遗址等符号以外,还要包括文化遗产的部分,它指传统的知识体系。

工艺品(Handcrafts)。指那些可用于制造和制作的特殊物品的原材料,按照特殊的传统技艺和方法进行加工、生产的工艺制品。它既可用于收藏,也可以用于市场交换。它包括传统的工艺制作技艺、革新与创造中所包含的“真实性”、符号的形象化意义、工匠等。旅游人类学家们非常关注那些旅游工艺品中的所谓“真实性”,比如,人类学家斯韦对我国云南撒尼、彝族地区的民族工艺品生产以及旅游市场的商品开发调查后,就提出了民族旅游工艺品中的“真实性”问题<sup>[47]</sup>。换言之,在具体的手工制品中可能包含着许多其他的社会因素。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具体的工艺品形象来“确认其真实性”<sup>[48]</sup>。

概而言之:“旅游文化”是旅游人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检验现代游客在旅游活动中“品位”的一个指标,更是现代旅游产业在决策和实践“可持续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它是理论性的,亦是实践性的。

#### [参 考 文 献]

- [1] Graburn H H Nelson. Tourism, Modernity and Nostalgia[A]. Akbar S. Ahmed and Cris N. Shore. (ed.). The Future of Anthropology: Its Relevance to the Contemporary World[C]. London & Atlantic. 1995:160.
- [2] MacCannell D. The Tourist: A New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x.
- [3] Reid D G. Tourism, Glob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M]. London/Sterling/Virginia: Pluto Press. 2003:73,55.
- [4] 纳什. 作为一种帝国主义形式的旅游[A]. 瓦伦 L. 史密斯主编. 东道主与游客: 旅游人类学研究[C]. 张晓萍等译,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2.
- [5] 转引自彭文斌. 中国民俗旅游的发展及中国学术界的参与趋势[A]. 王筑生主编. 人类学与西南民族[C].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8:287.
- [6] Brown F. Tourism Reassessed: Blight or Blessing[M]? Oxford, UK: Butterworth-Heinemann. 1998:6.
- [7] Butcher J. The Moralisation of Tourism[M].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3.
- [8] Nash D. Anthropology of Tourism[M]. Kidlington: Pergamon. 2001:1-2.
- [9] 张晓萍, 黄继元. 纳尔逊·格拉本的“旅游人类学”[J]. 思想战线, 2000,(1).
- [10] Smith V L., Brent M. (ed.) Hosts and Guests Revisited: Tourism Issues of the 21<sup>st</sup> Century[C]. New York/Sydney/Tokyo: Cognizant Communication Corporation. 2001:3,53.
- [11] 龚鹏程. 游的精神文化史论[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 [12] Middleton V. Marketing in Travel and Tourism[M]. Oxford: Heinemann. 1998.
- [13] Burns P M. An Introduction to Tourism & Anthropology[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30-31.
- [14] Clifford J.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66.
- [15] McIntosh R. Tourism: Principles, Practice, Philosophies[M]. Columbus, OH: Grid. 1977.
- [16] Wahab S. Tourism Management[M]. London: Tourism International Press. 1975:8.
- [17] Burns P M. An Introduction to Tourism & Anthropology[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25-26.
- [18] Smith V L., Brent M. (ed.) Response to Nash, D. “Tourism as an Anthropological Subject”[A]. Current Anthropology[J]. 1981. 22(5):475.
- [19] 瓦伦 L. 史密斯主编. 东道主与游客: 旅游人类学研究[M]. 张晓萍等译,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2:1.
- [20] Smith V L., Brent M. (ed.) Hosts and Guests Revisited: Tourism Issues of the 21<sup>st</sup> Century[C]. 2001:34.
- [21] MacCannell D. The Tourist: A New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1.
- [22] IUOTO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Travel Organization).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Travel and Tourism[A]. Geneva: International Union of Travel and Tourism[C]. 1963:14.
- [23] MacCannell D. Empty Meeting Ground. [M]. London: Routledge. 1992:5.
- [24] Nash D. Tourism as an Anthropological Subject[J]. Current Anthropology, 1981, 22(5):461, 461-481.
- [25] Smith V L., Brent M. (ed.) Response to Nash, D. “Tourism as an Anthropological Subject”[A]. Current Anthropology. [J] 1981, 22(5):461-481.
- [26] Clifford J.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M].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17-19.
- [27] Rojek C., Urry J. (ed.) Touring Cultures: Transformations of Travel and Theory[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1-4.
- [28] Appadurai A.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 Economy[A]. Featherstone, M. (ed.)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C]. London: Sage, 1990.
- [29] Rojek C, Urry J. (ed.) *Touring Cultures: Transformations of Travel and Theory*[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10 - 15.
- [30] Clifford J.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M].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31] Craik J. The Culture of Tourism[A]. Rojek, C. & Urry, J. (ed.) *Touring Cultures: Transformation of Travel and Theory* [C].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113 - 114, 121, 113, 122, 119.
- [32] Craik J. *Resorting to Tourism: Cultural Policies for Tourist Development in Australia*[M]. Sydney: Allen and Unwin, 1991: 27 - 28.
- [33] Geertz C.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5.
- [34] Hanna S P, Del Casino V J. (ed.) *Mapping Tourism*[C]. Minneapolis/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xxii.
- [35] Dwyer O J. *Memory on the Margins*[A]. Hanna, S P, Del Casino V J. (ed.) *Mapping Tourism* [C]. Minneapolis/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29 - 31.
- [36] Schein R. *The Place of Landscape: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an American Science*[J]. *Annals of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97. 87 - 4: 675.
- [37] Clifford J.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M].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66, 22.
- [38] 彭兆荣. 体验差异: 民族志旅游与人类学知识[A]. 杨慧等主编. *旅游、人类学与中国社会* [C].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
- [39] Graburn H H. Nelson. *The Ethnographic Tourist*[A]. Dann G M S. (ed.) *Tourist as a Metaphor of the Social World*[C]. Trowbridge: Cromwell Press, 2002: 20.
- [40] Clifford J.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M].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52 - 91.
- [41] Amit V. (ed.) *Constructing the Field: Ethnographic Fieldwork in Contemporary World*[C]. London: Routledge, 2000.
- [42] Marcus G E, Fisher M M J.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an Experimental Moment in the Human Science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 [43] Graburn H H Nelson. *The Ethnographic Tourist* [A]. Dann G M S (ed.) *Tourist as a Metaphor of the Social World* [C]. Trowbridge: Cromwell Press, 2002: 23.
- [44] Jameson F.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J]. *New Life Review*, 1984, 144: 60, 79.
- [45] Dorst J D. *The Writen Suburb: An American Site, An Ethnographic Dilemma*[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9: 3 - 6.
- [46] Smith V L, Brent M. (ed.) *Hosts and Guests Revisited: Tourism Issues of the 21st Century* [C]. New York/Sydney/Tokyo: Cognizant Communication Corporation, 2001: 112 - 115, 197.
- [47] Swain M B. *Ethnic Doll Ethnics: Doing Tourism Research in Southwest China*[A]. Smith V L., Brent, M. (ed.) *Hosts and Guests Revisited: Tourism Issues of the 21st Century*[C]. New York/Sydney/Tokyo: Cognizant Communication Corporation, 2001: 217 - 218.
- [48] Cohen E. *The Heterogeneization of Tourist Art*[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3, 20: 160.

**Tourism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n “Tourism Culture”**

PENG Zhao-rong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n tourism is quite of late. It seems to be a “late-comer” among applied disciplines. However, tourism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n “tousim culture” is not only of academic core value in its branch, but also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content for other disciplines and even for some policy-making departments. This paper tries to make an analysis of “tourism culture” in the study of tourism anthropology and relevant problems and offers some problems for the attention of academic circle. It is beneficial for both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the discipline.

**Key words:** anthropology of tourism; tourism culture; mobility; paradigm; ethnography

[责任编辑:廉月娟;责任校对:王玉洁]

## 《旅游学刊》在北京市 2003 年度 社科期刊质量评定中再获好评

本刊讯 由北京市新闻出版局组织的北京市 2003 年度社科期刊质量评选活动日前结束,经专家评审,包括《旅游学刊》在内的 65 种期刊被评为一级期刊(90 分以上)。《旅游学刊》在这次评选中获 98 分(最高分为 99.5 分),取得了好成绩。

本届期刊质量评定委员会由出版、编辑、教育、文字、印刷、外语、美术、广告等方面的专家组成,评比标准以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中国社会科学期刊质量标准》为依据,采用专家审读、小组评议、大组评审的办法,对参评期刊的政治、业务、编辑、出版状况进行全面评定,最后评选出包括《旅游学刊》在内的 65 种期刊为一级期刊(90 分以上)。